

文笔塔记忆

黄埔第一期学生蒋超雄

常州儿女 / 陈弼口述 陈坚整理

杀猪

“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……”

中学时读《木兰辞》，每次读到这句话，总会想到杀猪杀羊的场景。不过，我熟悉的，不是因为听闻阿姊征战衣锦荣归杀猪杀羊。

我小时候，杀猪杀鸡鸭鹅的场景，到了腊月，比较多见——我后来甚至亲自杀过鸡。杀羊是故乡难得一见的场景，但我也见过，杀自家养的羊。我没见过杀牛，父亲告诉我，一般农村杀牛，都是在耕牛病老将死时，父亲说，他亲眼看着牛的眼泪掉下来，看着心里难受……

在故乡，过去除了供销社收购站统一杀猪卖肉外，农家杀猪，其实是很大的事。通常三种情况可能会杀猪，过年杀年猪，最是常见。家里办大事，婚丧嫁娶，有可能杀猪，类似《木兰辞》里阿姊荣归场景。三是秋收之后，宗祠或生产队集体聚餐，可能会杀猪。当年我们西朱西生产队就用祠堂改建猪圈，养猪，大部分卖给供销社收购站，秋收后有些年份会杀猪聚餐，过年前杀猪分给社员，每家分一块肉。

杀猪是一种专门的手艺，不像其他农活容易学会。另外，杀猪需要置办专门的工具：杀猪刀、屠刀、扎钩、挺杖、刮毛刀、黄卵石、杀猪凳等等。

杀猪的人，书面说法叫屠夫。我故乡称屠夫为杀猪佬，著名的俗语“死了屠夫，不吃连毛猪”，在我故乡也会被方言说成“死了杀猪佬，弗契连毛猪”。

父亲是老家有名的杀猪佬，但他并没有拜师。在他杀第一头猪之前，只见过别人杀猪。他杀的第一头猪，是自己家养的年猪。过年前杀猪忙不过来，家里又要杀年猪，于是父亲借了工具，挽着袖子，硬着头皮上阵，把过去看杀猪看到的过程模仿了一遍，堂叔们负责揪猪摁猪，结果一刀功成。从此父亲置办了杀猪的家什，几年下来，成了本地有名的杀猪佬。父亲本是本地有名的捉鱼佬，腊月除了打鱼，得空还帮人杀猪，甚至有时打鱼回来，顾不得累，晚上还要去给人杀猪。一来别人请了，二来也可以挣钱贴补家用。

过去虽然穷，江南农家都将养猪作为副业，也会养年猪，过年杀了，一来自我犒赏，二来宴饮宾朋，三来腌咸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过去百业凋敝，供销社收购站统购统销的内，分配给农村的数量极其有限，不仅贵，还很难买。但是，谁家过年不用肉呢？所以，过年前，农家都会有杨白劳那种最穷也得给喜儿买根红头绳的逻辑，大小都要养个年猪过年杀。这不，腊月廿四旧俗点年财，小孩们在地里燃烧点着的稻草，嘴里都会喊“我家养个大年猪，你家养个大老鼠”呢。

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看父亲杀猪，不仅是自己家的年猪，亲戚朋友家的，还有周边村子里的。当然不仅是我，小孩们都喜欢热闹，村里的闲汉也是。

到村里人家杀猪，父亲通常会扛着杀猪凳，拎着装了屠刀杀猪刀扎钩刮刀黄卵石等的口袋，我和弟弟喜欢扛着挺杖屁颠屁颠跟在后面。挺杖其实就是一根成人小指头粗细，一米多长，一头有个小圆球，一头有个圆形握手的铁棍。

到了主家，父亲会让主家找副担绳，我架梯子，看地方架好，在梯子下面放上一只或两只干净的粪桶，边上还要摆上盛满水的水桶，水桶里当然还得有劲斗，或者大铜勺。摆好杀猪凳，让主家找个大盆，里边撒上一些盐（当年都是粗盐），放在杀猪凳左前方一些。然后让主家烧汤，不是在灶台，而是用来洗澡用的大浴锅，烧一锅开水。主家没有浴锅的话，得提前跟村里有的人家借用。

父亲会点上一根烟，去猪圈看看年猪，说一句，今年这头年猪大概能杀几刀肉。通常是7刀、6刀等——这是杀猪的行话，是估摸能杀多少斤肉的说法。一般猪肥大的，刀数就高，猪瘦刀数就低。其实这是考验杀猪佬的经验和水平、眼力。一般杀猪前猪不称重，杀猪佬来估算。比如说，300斤的猪大概能到8刀、200多

斤的到7刀，100多斤的6刀，等等。8刀，意味着大概能杀到靠近240斤猪肉的模样。父亲能够成为有名的杀猪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，全靠经验。

杀猪的时候，主家请的几个年轻力壮的人，通常三到四人，进入猪圈捉猪。捉住后，有拖有推。被捉住的年猪大概知道自己的命运，死命地挣扎，嘶声力竭地嚎叫。在猪圈里躲在角落里簌簌发抖的其他猪面前，几个小伙子将年猪从猪圈弄到杀猪地方——通常离猪舍很近。然后将猪抬上杀猪凳，抓住猪的前后腿，跪压，摁住，不让猪动弹。

父亲扔掉手中的烟屁股，拿着杀猪刀（一种短柄尖刀）过来，一手捂住猪嘴，一拧，露出猪颈；一手拿着杀猪刀，迅捷捅进猪颈的喉咙部位，刺入血管。刀尖随手腕转动，随即拔出杀猪刀，猪血喷涌而出，落入早已准备好的摆放在杀猪凳前的盆里。

刀刺入拔出的过程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。猪最后扭动几下，再也不动了，跪压在猪身上的壮汉也就松开了。

父亲吩咐主家将准备好的干净的开水慢慢倒入水盆，一边用杀猪刀木刀柄搅拌。猪血飙尽后，父亲会吩咐壮汉把猪抬到浴锅里。

浴锅里的水正烫着，壮汉们小心翼翼地猪抬入浴锅。猪经开水一烫，猪的长毛就很容易褪下。但褪猪毛时也烫手，猪却只会越烫越白。我理解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，就是从看父亲杀猪开始的。父亲在浴锅边上，翻动着浴锅的死猪，把褪下的猪长毛堆在浴锅的一角。按照旧俗，这猪毛归杀猪佬，猪毛晒干了可以卖给供销社，也是一笔积少成多的小收入。

父亲在褪猪毛的时候，杀猪场上已经按父亲吩咐用凳子架起了一扇门板。长毛褪得差不多时，壮汉们把猪从浴锅里拖出，抬到门板上，渐渐沥沥的水滴了一地。父亲会在猪的一只后脚附近，用杀猪刀切开一个口子，然后将挺杖一头插进口子，用力推送挺杖，看热闹的人，可以清晰看到挺杖在猪皮下腾挪的痕迹。父亲拔出挺杖，弯腰俯身，用嘴对着刀口吹气。眼见着瘪了的死猪肚鼓起来了，用绳子捆住刀口，防漏气。父亲接着在另一只猪脚处做同样的事。

做完，父亲拿出刮刀，一种握手是圆形卷筒的刀，专门用来刮短猪毛的。猪毛有长有短，长毛烫后可以手薅，短毛则要靠刀刮。

刮过短毛，父亲用杀猪刀割下猪头，扔在门板上，然后用扎钩扎进猪的一只后脚处。壮汉抬起猪，父亲将扎钩的另一端挂在梯子上，猪就倒挂在了梯子上。我则不用吩咐，拿着黄卵石敲击猪头上的那些细毛。

倒挂在梯子上的猪下面，放了一个大盆。父亲拿着杀猪刀，在猪肚上从上往下一划拉，猪肚剖开。父亲把猪肠拨拉进盆里，把心肝腰肺等搁在门板上（有时会用另外的木盒装起），将猪卵筋和猪尿泡扔在一边——旧俗，这些也归杀猪佬（猪卵筋去骚后炖烂，也是一道独特的风味，只是一般人家都不会弄）。接着用清水泼开猪膛，冲洗过，基本没血水时，父亲指挥壮汉，将猪抬回门板上。父亲用屠刀将猪一劈两半，然后将猪分割。通常是猪蹄要剁下，猪腿单独，然后将猪身子带着排骨切成几大块，扔进边上主家准备的铺了稻草的匾里。

父亲则开始简单清洗猪的大小肠。清洗完，杀猪的任务大体完成。父亲收拾行头，将猪毛装起，猪卵筋猪尿泡挂在挺杖上，洗手。主家这时会递过一块钱，这是当年父亲杀猪的工钱。父亲告诉我，如今请人杀猪，工钱大概得五六百了。关系好的主家，晚上往往会留饭，割一小块肉，用青蒜炒了，真美味。

父亲杀猪只是有空时挣些外快。对于父亲来说，过年杀猪的收入比捉鱼要少，当年他主要精力在捉鱼上。但我堂叔后来进了收购站，专门杀猪，一直到收购站改制后，还杀猪卖肉，甚至还拿到了退休金。我弟弟曾经跟着堂叔杀了一个冬天的猪，挣了20元钱。当然，那个时候，父亲已经基本不杀猪了。

现在商业发达，物质丰饶，故乡农村杀年猪的很少了，只有些富人放不下外面买的肉，自己养猪才杀年猪。传统的杀猪方式，我也很多年没见过过了。

常州有一位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，名叫蒋超雄（1903年—1991年），曾任常州市政协常委，1983年9月加入民革，1984年10月任民革常州市委第一届委员会主委，民革常州市委第二届顾问。曾任民革江苏省委顾问，常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，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，黄埔军校同学会江苏省分会顾问。早年热爱古典诗词，是舢舨诗社社员。

蒋超雄的常州寓所在前北岸，赵翼探花第东侧。1986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上午，天气晴朗，早餐后我应约前往北岸拜访蒋老。蒋老精神矍铄，记忆力很好。他说，他是武进东安镇人，父亲蒋克明是同盟会会员，曾参加辛亥革命。受父亲影响，他从小就爱看《岳飞传》，喜舞棍弄剑，立志做一个报效国家的男子汉。年少时在乡间读私塾，后进武进武阳公学，毕业后去上海民生纱厂做工。1924年5月，父亲的好友传来信息，说黄埔军校在沪招生。他兴致勃勃前往报名，终获录取，成为第一期步兵科四队学员。同年6月16日，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，孙中山致开学辞，对学员提出殷切期望。蒋超雄被热情洋溢的演说辞所激励，永远记住了中山先生“不仅要做一个有高度才能的军人，而且还要做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军人”的庄严号召。

黄埔军校课程很多，每天都排得满满的，训练和学习、生活都很严格、紧张。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，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连排营在行军、宿营、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，依次循序实施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穿衣服，打绑腿，紧急集合3分钟；出操时高唱校歌：“以血洒花，以校为家，卧薪尝胆，努力建设中华。”出操回来，吃饭限定10分钟；接着是上课，课后又出操；晚上自习。操场靠近珠江口，涨潮时操场里的水漫过脚，照样要出操。训练用的武器原先比较陈旧，后来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援。1924年8月，苏联将一艘商船改装为5000吨级的巡洋舰，途中绕开帝国主义的注意，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，武器包括3000支新式步枪和一批轻重机枪、山炮、迫击炮等。

不久，军校迎来平叛“广州商团事变”的首次战役。由英帝国主义一手



青年蒋超雄 蒋超雄撰《黄埔军校史料初稿》首页



1984年10月26日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州市第一次党员大会全体合影，前排左五是蒋超雄。

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武装广州商团，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权，开枪屠杀参加纪念武昌起义游行的群众，中山先生立即下令军校派兵平叛。军校连夜派出两支学生队，蒋超雄是队员之一。开拔途中大雨如注，积水盈寸，学生队军容整肃，步伐整齐，气势高昂，勇往直前，这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非常罕见，受到驻足观看群众啧啧称赞。战斗时，学生队更是个个争先，奋勇杀敌，首战告捷，蒋超雄表现出色而获嘉奖。

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下，政治工作相当活跃，革命性、战斗性很强，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。各学生分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，小组长名单公布，蒋超雄名列其

中。蒋超雄很紧张，午后悄悄去找周主任：“在分队里我年龄最小，论学资我最浅，论政治文化水平我最低，怕先生立即下令军校派兵平叛。军校连夜派出两支学生队，蒋超雄是队员之一。开拔途中大雨如注，积水盈寸，学生队军容整肃，步伐整齐，气势高昂，勇往直前，这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非常罕见，受到驻足观看群众啧啧称赞。战斗时，学生队更是个个争先，奋勇杀敌，首战告捷，蒋超雄表现出色而获嘉奖。”

11月下旬，校部公布了30个学生的名单，其中有蒋超雄。通知从明日起，到政治部参加开会学习。会议由政治部周主任亲自主持。周主任

作了简短的报告，他说：“校部经细致研究，选你们来进行短期的特殊的学习。今后你们的工作和所肩负的责任要比带兵的工作重得多，将在一条新的工作道路上摸索前进。”接着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。报告完后，30个人分成3个小组进行讨论，讨论题由周主任亲自制订，内容是革命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有关问题，既具体又全面，特别着重对民众、对士兵的教育组织和带兵官与同级部队长的关系问题。学习期间，周主任轮流到3个小组旁听，发现问题记下来，每天总结时提出。5天后学习结束，主任对大家讲话，他说：“部队政治工作要先想后做，要细致耐心，千万不能有急躁情绪。”周恩来主任精湛的学问和修养，亦严肃亦温文的风度，认真负责、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，循循善诱的教育态度，成为当时所有学生最敬爱最信赖的一位师长。

最近中午，我向蒋老告辞。他随即从书橱取出一份资料和早期照片送给我。这份资料题为《黄埔军校史料初稿》，写于1978年10月，字迹工整，内容丰富，计有76页，是一份珍贵的亲历亲见的“三亲”史料，具有文献价值。

40年前，蒋超雄担任民革常州市委第一届主委时，常称“自己的春天来临了，理应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’，有所作为。”他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各项方针政策，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。他不顾年迈病弱，积极与台湾、香港及海外的亲朋故旧取得联系，多次前往港台探亲访友，介绍情况，解释政策，尽心竭力奔波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路上，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蒋老晚年还撰写数十篇面向台湾的诗歌，展示祖国建设的美好、和平统一的期盼等，赢得了台湾亲朋好友的好评。1985年5月4日，他在台北《亚洲时报》发表了五言自传长诗《鹤鸣吟》，总计250字，回顾了他的一生经历，读之令人动容。《亚洲时报》说蒋老“英姿风发，不减当年，爱国爱民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大业……”诗歌发表后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，蒋老收到许多来信，表达鼓励、祝福和期盼。蒋老感人至深的爱国事迹曾获得民革江苏省委的赞颂与表彰。

那片土地，那些人，那些事

流年碎影 / 上官红霞

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每当生日这天，我都会想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，一些人，许多事。

20世纪70年代的武进经常有戏剧下乡演出。只要有剧团进村，我就会早早吃过晚饭，被嵌娘带着提前坐在一边——旧俗，这些也归杀猪佬（猪卵筋去骚后炖烂，也是一道独特的风味，只是一般人家都不会弄）。接着用清水泼开猪膛，冲洗过，基本没血水时，父亲指挥壮汉，将猪抬回门板上。父亲用屠刀将猪一劈两半，然后将猪分割。通常是猪蹄要剁下，猪腿单独，然后将猪身子带着排骨切成几大块，扔进边上主家准备的铺了稻草的匾里。

嵌娘的娘家是户人家，小时候家里雇的长工就有几个人。嵌娘的性格温润如玉、不急不躁、乐善好施，这大概是她那个富裕大家庭带给她的。

我记事起，就看见嵌娘在门前屋后种了好多中草药，远近乡亲谁家有人得了肝炎来求助嵌娘，嵌娘拿着镰刀到地里割几棵长得高高的药草给人家，交代他们怎么熬，怎么喝。年复一年，药草不断地割给人家，嵌娘不断地反复播种。嵌娘还有一个治疗“搭手”（就是背部腐烂，手刚好搭到，人们就把这种病叫“搭手”）秘方，很神奇，基本药到病除。那时我经常看见有人驮着一个很大的烂脓包来，嵌娘当场把药敷在来人的疮口上，再包一些药给他带回去。不管是肝炎药草，还是“搭手”药，嵌娘都免费给人家。她常挂嘴边有一句话：“行行好事的。”每年冬季来临，她会煮一大锅红枣中汤药，分给左邻右舍喝一碗，不知道里面的中药是啥，有什么功效，想着总归有好处，大家一个个“咕噜咕噜”全喝了下去。

就这样，附近认识我嵌娘的人很多，走过路过都要来跟她聊聊天长短。嵌娘记忆力很强，跟她说过的人、讲过的事都能记住，大家都愿意跟她聊。于是乎十里八乡好多人亲热地喊她“寄娘”。八月半，那些叫“寄娘”的人都会给她送一两卷百果月饼，我也跟着一起分享。

嵌娘亲手带大了十几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。我是嵌娘的大孙女，大堂弟只比我小两三个月，嵌娘右手抱着我，左手抱着堂弟，一直到我们四五岁还经常这样抱着。我和堂弟睡觉也要跟嵌娘睡。嵌娘有着极好的耐心，从没说过我们不懂事，只是不断地给我们讲故事，还让我背佛经，虽然后来她忘记了，但就是从背佛经开始，我的记忆力也被训练起来了。

后来外出读书、工作，节假日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嵌娘聊天。嵌娘很善于倾听，我可以把外面遇到的任何事说给她听，她偶尔也会插几句话。她嘴里没有贬义词，也从不会生气，永远是平和、温暖、亲切的，跟她在一起我总是如沐春风。

嵌娘出生在武进一个姓陈的大家族里，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。嵌娘有两个阿哥，大阿哥脸瘦瘦长长，跟嵌娘长得不太像；小阿哥脸圆圆胖胖，跟嵌娘长得很像。两个阿哥经常来我家看他们的细妹子（常州方言，小妹妹），从进门招呼、寒暄聊天、吃饭劝菜，直到挥手告别，嘴里的细妹子要喊无数遍。嵌娘有三个姐姐，估计过世得早，我没见过。只记得那时她大姐的两个女儿经常来我家，“娘娘娘娘”叫得很热络。无锡二姐家的儿子、女儿也时不时乘轮船来我家住一阵。小时候，我跟那些亲戚都很熟，他们来后，跟嵌娘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亲戚提出想去谁家，我就提前跑到那家看看是否有人在，并通报某位亲戚马上来了，然后快速回家，屁颠屁颠地陪同亲戚到我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家做客，以致现在那些亲戚的音容笑貌我还有印象，他们的名字我也能一一记起。

女家，去其他亲戚家，总会带着我和堂弟，远远近近的亲戚都记得我的名字。去得最多的是嵌娘娘家，暗红色大门很高很宽，门楣也高，很吃力地跨进去后，就是很宽敞的厅堂，舅公舅婆伯伯伯母姑姑一圈叫完，就没我事了。嵌娘回娘家好像也没别的事，就是去吃饭、聊聊天。下午回来时，嵌娘和她大阿哥大阿嫂轻声细语地说着话，从南面大门口一路走一路说，穿过厨房、走过明堂，再从卧室旁边的过道，一直说到后门那里的杂物间还没说完，于是索性停下来继续说。我和堂弟就耐心地等着，仰头看着他们，直到他们说完所有要说的话，嵌娘才带着我们依依不舍地跟她大阿哥大阿嫂挥手告别。

记得我刚上幼儿园那年，嵌娘带着我和堂弟去了她无锡的二娘家。我们是搭便船去的，那是一条机帆船，船头一台黑乎乎的柴油发动机一直“啪啪啪”地轰鸣着，很是吵闹。船上三个健壮男人，一个操作发动机，一个双手拿一支长竹篙，左右边不停地抵着水底，辅助发动机操作手把控船的方向，还有一个手拎一个很大的圆球，当两船交会时，他迅速跑到交会那一面，把圆球搁在船舷上，防止船与别的船碰撞。船开了不长一段河路就进了太湖，湖面非常宽阔，对面不时有轮船开过来，掀起的巨浪把我们的机帆船颠得七高八低。由于水浪的阻力，我们的船无力地趴在水面，没法往前走。掌舵师傅大叫“快扯篷”，那两人立即麻利地使劲把篷扯得高高的，风吹帆鼓，我们的船终于轻松了些。快到无锡了，就在大家看到希望露出欣喜时，对面开过来一艘大船，速度很快，对我们那个胖胖的圆球来不及放到两船交会处，就被硬生生地撞了

一个洞，船里进了一些水。但那三个男人很淡定，依然把船稳稳地靠在了无锡码头上。嵌娘领我们上了岸，一路走一路问，到了她二娘家，一个高个子男人接待了我们，他喊嵌娘“娘娘”。他家房子很小，印象最深的是睡觉的地方，床在逼仄的木楼梯上面，上面就是屋顶，很矮。我艰难地爬到黑黄黑黄的木头楼梯最顶端，硬是把自己矮矮胖胖的身体塞了进去，感觉呼吸都有点压抑，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透不过气。早晨醒来又走了其他几个亲戚家，晚上再回到那个狭小的阁楼睡觉。

嵌娘小时候时兴三寸金莲，但嵌娘的脚只裹了几天，因忍受不了那种钻心的疼，她母亲就帮她松开了，从此再没裹脚。嵌娘个子不高，脸圆圆的，从没高声说过话，走路也稳稳当当，看起来不是那种很要强的女人，但她的做人委实让人舒心，她逢人就夸儿媳妇儿子的好，夸孙子孙女好。我们不好也不行，有时我在想，人好是夸出来的。

嵌娘娘家的侄子侄女都散落外地，在南京，在上海，有几个还在名牌大学当教授，还有一个小侄子读了硕士出国了。逢过年时节，从各个城市回老家过年的他们，都会带着自己子女来看他们的细八八（小姑娘，常州方言）和小姑婆，一声声亲切的细八八、小姑婆，叫得人心底柔软，毕竟血液于水，嵌娘是他们陈家的亲人啊！

嵌娘走时九十岁，我很不舍。我的父亲，为人也跟我嵌娘一样，他也走了，我很不舍。今天，陈家老屋早已拆了，陈家跟我也越走越远，但陈家的故事，故事里的事，故事里的人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。